

共匪「文革」與對外關係

邢國強

一 「文革」遠因起於對外關係惡化

毛匪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清算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則，按其日程表所顯示的時期，是起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姚匪文元根據毛匪澤東九月間在匪黨中央提出的「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指示，於上海文匯報刊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開始，揭開了鬥爭的序幕，但以其整個運動的本質言，實應遠溯至一九五三年以後與俄關係之惡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亡，一九五三年九月，黑魯曉夫踢開馬林可夫担任俄共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魔在俄共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之祕密報告，對史魔進行「鞭屍」，這一反對個人迷信的原則，不僅影響了俄共及各附庸國家以後的政策路線，且對一貫個人獨裁之毛匪澤東，為一重大之打擊。同年九月，匪黨召開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鄧匪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同樣模擬黑魔原則，指出「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又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成績，就是告訴了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根據這項理論原則，乃將七大大會中訂定的黨章予以修改，原列「毛澤東思想」為匪黨「行動方針」一節取消，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之方針」，此一決議，使毛匪在黨內之聲望大為減低，因而毛匪在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匪黨八屆六中全會中表明不再繼續担任下屆匪偽政府主席職務，失去了個人在黨政兩方面的獨裁地位。毛匪此

次發動「文革」，其主要目的，在重振其「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的領導思想，恢復其本人之領導地位，設若沒有當初黑魯曉夫對史魔之「鞭屍」，亦不可能形成鄧匪小平之排毛行動，「文革」亦不可能產生，此其一。

其次，共產國際政策路線的分歧，亦為共匪對外關係惡化的主因。俄共二十次大會中，黑魯曉夫提出以攻勢性的「和平共處」原則，代替「革命輸出」的暴亂政策，承認「和平過渡」的議會鬥爭道路，可以代替用暴力奪取政權，事後復經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八十一個共黨及工黨會議通過（莫斯科宣言），迄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九日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布里茲涅夫之繼續承認，此項國際鬥爭路線，大致上已成爲共產國際當前一致的對外政策。其間，黑魯曉夫並以實際行動，於一九五九年九月，親訪美國，與前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會談世局。雖然俄共基本政策仍在貫徹其世界革命的野心，但這些陰謀手段，在共產集團中仍宜列爲統一的政策路線，這一連串的事實，與素奉史魔「暴力革命」爲圭臬之毛匪澤東對外滲透顛覆思想，有極大的距離。本來，共匪在對外關係方面，亦有採取「和平共存」的原則構想，如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廿九日周匪恩來代表匪偽政權與印度代表在平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時，即提出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外交政策。次年四月，在萬隆亞非會議中，復成爲毛共對外進行統戰的主要憑藉，惟自俄共整肅史魔，及排斥個人崇拜思想後，共匪內部乃形成理論上的嚴重分裂，一方面，毛匪澤東以史達林大國沙文主義思想，與「人民戰爭」相結合，對俄共的政策路線，大加抨擊，一九五九年林匪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全力宣揚暴力革命思想路線，並提出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爲世界之鄉村，包圍歐美兩洲之世界之城市，藉以反對俄共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政策路線。另一方面，當政之劉匪少

奇，則全力推展「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及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持要少），與俄共的「和平共處」原則相呼應，尤其是楊匪獻珍之「合二而一」哲學思想，與毛匪「一分爲二」作敵對的思想鬥爭，亦爲對外政策路線紛歧之代表。「文革」的目的，即在反對俄共的「修正主義」的對外政策，設若匪俄方面，無原則性之爭論，共匪內部分裂情況當無如此嚴重，此其二。

第三個問題是俄援斷絕後之經濟路線問題，一九五九年六月，蘇俄拒絕向共匪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九六〇年七月，蘇俄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匪區之專家，主動解除合約三三四件，並停止俄援，使一貫依賴蘇俄支援之共匪軍事工業與一般生產建設，遭遇嚴重的挫折，其時適值毛匪採取標新立異的極左經濟政策——三面紅旗，其中「人民公社」政策，引起農民之全面反抗，經此打擊，生產更形低落，社會秩序紊亂，尤以「大躍進」政策中之「土法煉鋼」，全國民力，消耗殆盡，在此內外危機壓迫之下，「當權派」劉匪少奇政權，不得不改採退却性的經濟路線——「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藉以挽救共匪內部的經濟危機。這一經濟路線，似乎較能適合當時共匪的內情，然相對地即消除了毛匪對俄鬥爭的憑藉，並使毛匪的左傾「前進姿態」，成爲一大諷刺。（按俄共及附庸集團曾對「人民公社」政策，有所批判）故毛匪發動「文革」之目的，當在挽回其「三面紅旗」失敗之命運，堅持極左的經濟路線，設若沒有俄共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對共匪斷絕支援，則「文革」亦無大規模整肅之必要，此其三。

由於對俄關係之日益惡化，因而，使共匪的外交活動，亦自民國五十四年巔峯時期，作直線之下降；首先遭遇失敗者爲第二次亞非會議，因俄共之杯葛與阿爾及利亞之政變，而告延期，使共匪圖以亞非會議操縱與會各國，召開新興力量會議，計劃與俄對抗的陰謀，頓成泡影。其次一重要關鍵，爲印尼共黨政變的失利，使得親匪的印尼政府，一變而成爲反共的政府；特別是失敗在林匪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後不足一個月，接着爲非洲若干國家如上伏塔、達荷美、迦納，及中非共和國等與匪之斷交，均使共匪外交上蒙受排擊，設若沒有這些對外關係之挫敗，特別是劉匪少奇借妻王光美等出國訪問之友好國家印尼之轉變，則其內部權力鬥爭可能不會太顯著，

至少會暫告緩和，「文革」發生以後，僑外交部長陳匪毅之遭受批鬥，其對外關係之惡化，亦爲主要原因，此其四。

就上述舉例，已可說明毛匪發動「文革」的本質，實起緣於對外關係之惡化，因爲對外關係遭受挫折，影響毛匪個人名位之低落，內部之分裂，由此遠因逐步積累下來之思想路線鬥爭，乃匯成一幕以文藝整肅爲起點的實際政治鬥爭，所以當姚匪文元揭露吳晗「海瑞罷官」之「錯誤思想」後，政治上的弱點乃告全部暴露，毛劉之間的奪權遂趨於明朗化。

二 「文革」期間瘋狂的排外行動

根據毛匪自己承認，當「文革」發動時，僑都北平在彭匪真、鄧匪小平等控制下，連得一根針亦插不進去，在如此不利的情勢下，毛匪所採取的戰略部署，是打亂了再看的羣衆路線。毛匪說「一年來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然各地很亂，這裏亂，那裏也亂，沒有什麼關係，像武鬥也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就好解決」。所謂「造反有理」，將傳統的秧歌王朝，澈底砸爛，打破舊狀，重新幹起。因此，「文革」發動伊始，毛匪採的是瘋狂的極左盲動路線，這種作法，正迎合了無知青年的不滿現實的幻想，於是，「紅衛兵」成爲造反革命的主力軍，到處滋擾，到處破壞、屠殺、迫害、搶劫、焚燒，一切非法罪行，均成爲合法的鬥爭，這一先天性的反動原則，施之於對外關係方面，乃形成類似義和團的瘋狂排外仇外行動，非但被匪指爲「帝國主義」之西方國家，成爲排拒的對象，甚至一直與匪保持友好之國家，亦在被攻擊之列，使周匪恩來、陳匪毅等十餘年來所建立的對外友好關係，全部加以否定。負責對外統戰之匪要如李維漢、邢西屏等均遭批鬥，統戰工作亦告全部瓦解。加上僑外交部、僑務工作委員會等受軍事管制，成爲林匪彪的「人民戰爭」附屬機構，其對外關係遭致共產集團與西方國家之一致唾棄，當非偶然，在此期間，有些比較具體的行動，可以約略舉例說明之：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以後，手揮毛匪語錄、胸佩毛魯像章的匪區海外留學生、匪駐外使館人員、及若干親匪華僑，正像着魔的野獸，在世界各地四處滋事，這種暴行，可名之爲「紅衛兵的輸出」，實際上，亦均獲得毛匪之支持與讚揚。首先，八月廿九日，北平紅衛兵開始在「反修」的口號下，將蘇

俄使館附近道路更名為「反修路」，三十日，集體向蘇俄駐匪使館作示威遊行，引起蘇俄對匪之抗議。

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廿五日，匪區留歐學生六十九名，途經莫斯科返回匪區，在列寧史達林墓園獻花，並朗誦毛語錄，事為蘇俄警察阻止不果，雙方發生衝突，三十餘名學生受傷，是為「一、二五事件」，毛匪為此特致電慰問，並攻擊蘇俄暴行，使匪俄與匪甸（牙利）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

同年二月，匪駐俄使館展出「文革」及「一、二五事件」真相照片，蘇俄認為歪曲事實，侮辱蘇俄政府與人民，阻止結果，又發生衝突，以致有三名匪方人員受傷。五日，偽政府聲明抗議，偽人民日報並以「世界外交史上野蠻暴行」為題，攻擊蘇俄。

在法國雷諾市留學之匪區學生四十九名，為申援「一、二五事件」，至巴黎俄國使館抗議示威，並與法警衝突，偽政權於一月卅一日提出抗議。

香港暴動事件，開始於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以九龍城新蒲崗「香港製花工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為導火線，觸發與港警之戰鬥事件，在共匪有組織的策動下，頃刻成為全港性的暴亂事件，五十九個左派勞動團體，組成反英聯合罷工組織，發展成為全港政治性的總罷工，至七月十六日英國遠東軍司令抵港，並增派遠東軍彈壓，方始逐漸平息。由於香港事件之引發，北平英代辦處被暴民搗毀，代辦被毆傷，人員遭扣押，在倫敦的偽使館館員，亦與英國警察，發生鬥毆事件。這些違背國際法外交特權的殘暴行動，使一貫以媚匪為主的英國，亦與共匪發生外交上之裂痕，世界各國對共匪不顧外交的野蠻行為，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紅衛兵輸出」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者，為緬甸的親匪華僑，共匪利用緬甸地區之外交特權，向附匪華僑及其子弟宣揚「文革」與「紅衛兵」思想，公然在僑校內外展開崇拜毛匪澤東運動，無視緬甸治安禁令，以暴力對付緬甸教師，毆打緬甸記者，踐踏緬甸國旗，結果觸發緬甸的全面反抗，匪偽駐仰光各機構，均受緬人襲擊，匪外交人員及專家等被毆重傷者達一百餘人，附匪華僑及學生被捕者逾一千三百人，被當場打殺者一百餘人，在這種全民性的反匪浪潮中，共匪祇能悄然撤退駐緬人員，並在偽人民日報上大刊反緬文字，同時，以毛匪「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人民戰爭」思想，煽動緬共起而反抗尼溫政府。

其餘個別性的排外行動，如對尼泊爾、柬埔寨等國，均引起各國對匪之不滿，而逐漸趨向於反共途徑。

三 「文革」造成對外關係全面孤立

由於「文革」期間採取對外暴行之結果，因而這十幾個月來的共匪對外關係，已經接近於「鎖國」的孤立狀態，近年內與匪幫停頓外交關係者，計有印尼、突尼西亞、迦納、肯亞等國。與匪幫發生嚴重交惡者，計有蘇俄、英國、印度、緬甸、「外蒙」、南斯拉夫、法國、匈牙利、荷蘭等國。與匪幫發生紛爭者計有波蘭、捷克、錫蘭、阿爾及利亞、尼泊爾等國。嚴格地說，目前與匪幫仍維持一致行動之友好關係者，僅有阿爾巴尼亞一國，其餘如阿聯等中東阿拉伯國家，不願與毛匪太親近，以免影響與蘇俄的關係。若干非洲國家如坦尚尼亞、尚比亞、剛果（布市）、馬利、幾內亞、索馬利亞，以及亞洲之巴基斯坦、南葉門等國，則係共匪以經濟收買、與利害關係，暫時保持外交關係，以充場面者，雖則如此，但今年參加偽國慶之各國代表團中，能代表政府者，僅阿爾巴尼亞一國，其餘越南、日本、紐西蘭、印尼、寮國、巴基斯坦、緬甸等國代表，均係以共黨身份參加，與其政府無關，其中最滑稽的是印尼共黨代表托羅普，實際上為流亡在匪區之印尼叛徒，亦居然代表其印尼共黨出席偽慶。從此次參加偽慶之各國人員少得可憐來看，其對外關係之孤立，似已趨向於窮途末路之境地。

除了對外政策上的趨向孤立外，人員上之整肅，亦為主要原因。偽駐外使館人員在「文革」期間，先後被毛匪召返國內接受改造者，十七個月來總共有一千另三十三人，佔全部駐外人員百分之五十五強，這些人員仍能返回任所者祇有二百另七人（美方新聞資料）。本來，匪偽駐外人員，大都經過匪特工系統物色派遣，並皆負有情報的特殊任務者，然在「文革」的大浪潮中，仍無法逃脫鬥爭批判的命運。目前與匪有邦交關係之四十七個國家中，僅阿聯一國，共匪仍派有大使黃匪華外，其餘四十四個，均為臨時代辦主任，維繫未斷的關係，南葉門與模里西斯兩國雖已建交，尚未聞派有外交人員。茲將共匪駐外人事概況列表說明如後：

國名	建交日期	僑使職別姓名
阿爾巴尼亞	一九四九、十一、廿一	臨時代辦 姚吉年 原大使劉曉被門， 改派許建國，許又 被門，可能由代辦 李庭荃代理
阿富汗	一九五〇、一、十二	臨時代辦 姚吉年
阿爾及利亞	一九六二、七、三	臨時代辦 陳金龍
保加利亞	一九四九、十、三	臨時代辦 王本祚
緬甸	一九四九、十二、十七	臨時代辦 蕭明
柬埔寨	一九五八、七、廿三	臨時代辦 鄭斯雄
錫蘭	一九五〇、一、六	臨時代辦 國鷹
剛果(布市)	一九六四、二、廿二	臨時代辦 李琛光
古巴	一九六〇、九、廿四	臨時代辦 李善一
捷克	一九四九、十、五	臨時代辦 朱笙方
丹麥	一九五〇、一、九	臨時代辦 林樺
芬蘭	一九五〇、一、十三	臨時代辦 李春田
法國	一九六四、一、廿七	臨時代辦 易素之
幾內亞	一九五九、十、四	臨時代辦 林秉南
匈牙利	一九五九、十、四	臨時代辦 劉俊章
印度	一九四九、十二、卅	臨時代辦 陳肇源
伊拉克	一九五八、七、十八	臨時代辦 張維平
肯亞	一九六三、十二、十四	臨時代辦 郭志強
寮國	一九六二、九、七	臨時代辦 李聯平
馬利	一九六〇、十、十四	臨時代辦 劉和林

茅利塔尼亞	一九六五、七、廿六	臨時代辦 衛永清
外蒙	一九四九、十、六	臨時代辦 劉吉德
摩洛哥	一九五八、十一、二	臨時代辦 丁文彬
尼泊爾	一九五五、八、一	臨時代辦 屠國維
荷蘭	一九五〇、三、廿七	臨時代辦 沈韋良
挪威	一九五〇、一、七、	不詳，一說爲僑臨 時代辦馮于九負責
巴基斯坦	一九五〇、一、五	臨時代辦 徐英
波蘭	一九四九、十、五	臨時代辦 陳東
羅馬尼亞	一九四九、十、三	臨時代辦 馬絃新
索馬利亞	一九六〇、十二、十四	臨時代辦 鄭佩堂
南葉門	一九六八、一、卅一	未派
蘇丹	一九五八、十一、卅	原大使俞沛文召返 後未派
瑞典	一九五〇、一、十五	臨時代辦 劉翼才
敘利亞	一九五六、七、二	臨時代辦 于俊
坦尚尼亞	坦干伊加： 一九六一、十二、九 桑給巴： 一九六三、三、十二	臨時代辦 周伯萍
烏干達	一九六二、十、十八	臨時代辦 章立
蘇俄	一九四九、十、二	臨時代辦 安致遠
阿聯	埃及： 一九五六、五、十六	大使 黃華
英國	一九五〇、一、六	臨時代辦 沈平
葉門	一九五六、八、廿一	臨時代辦 鄭康平
南斯拉夫	一九四九、十、五	臨時代辦 于立暄

共匪「文革」與對外關係

尚比亞	一九六四、十、廿九	臨時代辦	李振河
東德	一九四九、十、廿七	臨時代辦	劉輔
瑞士	一九五〇、一、十七	臨時代辦	楊旭
北韓	一九四九、十、四	臨時代辦	王彭
北越	一九五〇、一、十五	臨時代辦	陸維劍
模里西斯	一九六八、三、十二	未派	

四 「文革」成敗與共匪對外關係

「文革」發展至本年九月，毛林集團已完成全匪區各省市廿九個「革命委員會」的組織，大體上已經將省市級統治機構按照毛匪「文革」的要求，樹立起新的政權形式。雖然，林彪、周恩來、江青各匪談話透露：今後仍將繼續對內進行鬥批改，發動鬥批改的新高潮，匪黨的「九大」尚未召開，偽政權主席劉少奇等已遭「非法排除」，可能還有更混亂的局勢。但由於大的鬥爭方向上已趨向緩和，因此，其對外關係究竟如何變化，乃值得各方注意。一般對此問題，有幾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認為共匪對內大的鬥爭緩和，可能再度考慮到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持這種看法的，並不是與共匪已有邦交之國家人士，主要還是屬於與匪敵對的民主國家中的姑息主義份子，希望能由共匪自動轉變對外關係，使之有機會能與共匪商討世界和平問題，這種看法主要的錯誤，是沒有認清共匪政權的本質，以及毛匪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在本文第一段中，已經說明毛匪發動「文革」的遠因，為對外關係的惡化，而毛匪賴以展開肅肅的藉口，亦為反對劉少奇等傾向於修正主義路線，因而，對外關係之惡化，在毛匪言，實為其鬥爭勝利的成果，沒有什麼值得惋惜的；即使「文革」取得全面性的勝利，毛匪亦不可能改變其反修、反美、以及暴力革命的對外政策，何況目前距離「文革」勝利之期，尚屬遙遠，則更不可能使毛匪的外交姿態，有所軟化，除了在經濟因素上，毛匪為了貿易和結匯有利條件，會趨於部份的軟化。其次，另一種看法，為毛匪「文革」的對內整肅較為緩和後，是否會加強對外侵略，在世界各地重燃戰

火，這一看法，我們認為比較有此可能。因為毛匪的「人民戰爭」與「世界革命」的野心，始終沒有放棄，尤以林彪當權後，這種思想可能更為猖狂，問題是，今日的亞非拉丁美洲，已非第一次亞非會議時期可比。目前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自從共匪發動「文革」以來，對共匪的基本弱點，均有所認識，許多國家的轉向反共，是經過實際政治觀察與內部鬥爭的結果，決不可能因共匪的少數滲透力量，會走向親匪的道路，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共匪如果走對外擴張的道路，可能會四處碰壁，到處失敗，不僅自由民主國家對匪的排拒，已日趨積極，且共產集團方面，亦必趨向於對毛匪的一致唾棄，而不予支助。故我們可以得一結論，這第二個方向，雖然為共匪可能採取的途徑，但是，共匪基本上大有困難，無力達成此項野心。話雖如此說，在東南亞地區進行小規模之滲透，並利用各該國家的共黨份子，堅持毛匪澤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叛亂原則」，未始沒有此種可能，仍值得各民主自由國家一致的提高警惕，以免為匪所逞，為姑息主義所貽禍，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上接第21頁)

- 濟會議財政金融及價格構成小組會議的講話：「不是明天，而是今天」(一九六八年七月「經濟報」第廿八期)
- 七、蘇俄國家銀行白俄羅斯共和國辦事處主任 P. A. 撲捷林在蘇俄全國經濟會議財政金融及價格構成小組會議的講話：「固定基金的信貸」(一九六八年七月「經濟報」第廿八期)
- 八、蘇俄國家銀行理事會理事 N. D. 巴爾科夫斯基在蘇俄全國經濟會議財政金融及價格構成小組會議的講話：「關於信用貸款的計劃工作」(一九六八年七月「經濟報」第廿八期)
- 九、蘇俄哈薩克財政部副部長 D. M. 穆卡謝夫在蘇俄全國經濟會議財政金融及價格構成小組會議的講話：「加強共和國的預算」(一九六八年七月「經濟報」第廿八期)
- 十、蘇俄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N. K. 巴伊巴科夫在蘇俄全國經濟會議的講話：「完善計劃工作和改進國民經濟經濟工作的任務」(一九六八年五月「經濟報」第廿一期)